

民族迁徙与云南边地民族涵化

——兼谈遗传学的民族关系研究

苍 铭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 北京 10081)

提 要: 本文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民族学田野调查, 揭示了云南边境部分地区民族融合的历史, 力图说明这一地区虽然在生态和文化上具有典型的多样性特点, 但许多民族的构成却是多源的。我们在研究民族间的遗传关系时, 出现难以解释的结果; 或者同一民族, 不同研究者的研究得出差异较大的结论, 往往是把民族支系或更小民族群体的遗传标记当作整个民族的遗传标记。遗传学的研究成果对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解决民族识别遗留问题, 探索古今民族关系, 揭开古代民族文化之谜有重要的意义。

一、云南边疆地区的民族涵化

由于云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具有突出的多样性特征, 以及地理上的相对隔绝, 人们通常把这一地区的民族都视为“相对隔离群体”。因此, 近年关于这一地区的人类遗传学研究有较多的成果发表, 该地区也成为国内少数民族遗传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地区。从历史文献的研究来看, 澜沧江以西的云南边疆地区, 清代以前除滇西以外鲜有汉族人进入, 不同来源的少数民族迁徙却十分频繁。民族迁徙往往使一些相对隔离民族群体发生经济、文化甚至血缘的交流。民族间的文化整合, 文化人类学、民族学通常称为涵化(acculturation)。历史上, 云南边疆地区的民族涵化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少数民族间的涵化; 二是汉族融入少数民族中; 三是少数民族融入汉族之中。

1、少数民族间的涵化

怒江峡谷内的民族涵化

怒江峡谷是云南境内地理上最为与世隔绝的地区, 人们通常都认为生活在这里的独龙族、怒族、傈僳族、白族(勒墨人)是较为隔离的群体, 但历史和民族学研究发现, 即便是在这样封闭环境中, 民族间也发生过文化和基因的交流。

独龙族和怒族是峡谷内最古老的民族。从民族分布看, 独龙族现在主要分布在怒江峡谷的北端和独龙江流域; 怒族分布于怒江峡谷, 分为四个支系, 他们是: 阿龙(贡山)、阿怒(福贡)、怒苏(原碧江)、若柔(兰坪)。其中贡山的阿龙人远古时与现分布独龙江的独龙族是同一民族, 由于高黎贡山的阻隔, 他们与迁入独龙江的独龙族经济文化逐步减少, 而与怒江峡谷内怒族的联系更多, 并逐步与怒族产生文化认同感而变成怒族。因此, 如果我们在做怒族的遗传学调查时, 如果不了解这一历史过程, 以阿龙人为怒族的调查对象, 所得到的结论可能和独龙族的完全相同。

傈僳族迁入怒江峡谷后, 怒族和傈僳族发生了较大范围的文化涵化。从明代开始傈僳族先后进行过三次民族大迁徙, 从碧落雪山以东迁入怒江峡谷。三次民族大迁徙使峡谷内傈僳族人口远远超过了土著的怒族、独龙族, 以及和傈僳族同时迁入怒江的汉族、白族(勒墨支系)的总和。由于傈僳族在人口、经济上的相对优势, 以及政治上的控制, 一些怒族

村寨在适应傣族进入的过程中,逐渐改操傣语,融入傣族文化。如福贡县的其朱、埂及、底白、多屋、白布多、达普洛、打幽、利民、巴基、孤打、阿打戛、孟固底、鹿马登、干坡、安基、计却罗、面谷、拉马谷等 19 个村寨的怒族,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已大部分傣化。变成了傣。原碧江县一区的知子罗、老母登、普乐、果乐等乡的怒族与傣族交往更密切,几乎全部改操傣语,起居、饮食、服饰均与傣族无甚至差别。这些文化特征傣化的怒族,很可能遗传特征和原怒族是一致的,和其他傣族则有较大区别。

勒墨人(白族支系)迁入怒江后,由于澜沧江、碧落雪山、怒江的阻隔,勒墨人与内地白族经济文化上的往来断绝,由于同处于一个狭小的区域,相互间的影响使勒墨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与傣族、怒族逐步走向一致,与傣族长期杂居的村寨,由于与傣族通婚,语言、习俗多傣化。1932 年——1935 年福贡设治局调查人口时,因为勒墨人的习俗基本与傣族相同,地方官员们就把他们统计为傣族。1982 年人口普查时,又把他们都划为白族,但他们都自称“傣勒墨”即变为傣族的勒墨人。到 20 世纪 50 年代,历史上与傣族杂居通婚的勒墨人村寨多改操傣语,勒墨话(古白语)只在本民族内部通行,而怒族的语言也仅在本民族内部或家庭内使用。此外,还有一些自称为“怒扒氏”或“勒墨氏”的傣族,如碧江二区南熬甲村约阿念自称姓“怒扒”,福贡二区的四阿欠也说他们的祖先姓“勒墨”,可能这些人的祖先原为怒人或勒墨人,后融合于傣族了。^①福贡马鹿登、马吉的怒族除自称是怒族外,语言和习俗与傣族完全相同,已融合在傣族之中。^②1950 年中央访问团二分团访问怒江时发现:“在这个大河谷里住着傣族、怒族、勒墨人和少数的藏族、浪速、纳西族、佻人和汉人,其中以傣族最多,傣语成为怒江区流行语。生活方式除了藏族和少数汉人外,几乎全部傣化。”^③由于傣族中融入了其他许多民族成分,因此我们在研究傣族的遗传标记时,一定要选择好调查的对象,否则,结论很难解释。

傣族对边地少数民族的涵化

傣族是云南边疆人口最多分布最广,政治、经济、文化相对较发达的民族,历史上傣族文化对一些人口少的民族产生了较大影响,许多民族融入了傣族之中。

融入傣族的阿昌族

20 世纪 50 年代的调查显示,阿昌族在中国的人数比历史上大大减少了,这是因为:第一,阿昌族不断向西迁入缅甸;第二,由于逐步变为傣族而减少,如梁河罗卜坝和小陇川坝的许多阿昌族寨子现在都变成了傣族,青年人不会说阿昌话了,他们和傣族结婚,结婚以后,不论是嫁出去还是娶进来,都会慢慢讲傣语,穿傣族服装,一切风俗习惯都学傣族。其次是因为租佃关系或其他经济生活上的关系常常和傣族接触,或者和傣族同住一个寨子,或者和傣族寨子紧邻,于是在语言和风俗习惯上逐渐变成了傣族。^④

融入傣族的佤族

佤族是滇西边地最早的居民之一,历史上分布十分广泛。明代以前,德宏和西双版纳都有较多的佤族,清代以后逐渐减少,到民国末年这两个地区的佤族,除迁走的以外,留

^① 《傣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省人民出版社,1981 年 10 月 1 版,第 8 页。

^② 福贡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贡县志·民族宗教》,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6 月 1 版。

^③ 云南省编辑组:《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报》(上),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 年 2 月 1 版 1 页。

^④ 云南省编辑组:《德宏傣族社会历史调查》(三),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 3 月 1 版,58 页。

下的大多被傣族或其他民族所涵化。明嘉靖年间杨慎的《南诏野史》云：“商贾出腾越州入木邦地者，必经其地，呼为‘卡利佉’。有生熟二种，生者劫掠，熟者保路”。腾冲到木邦之间，即今天的德宏州地区，也就是今云南当地人称为边六县的地区。但到20世纪50年代时，滇西边地只有腾冲和梁河两地有佉族分布，大多被傣族和汉族所融合，如迁入盈江的佉族就完全融入了傣族之中。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新编的《盈江县志》中，已没有佉族的记载。

融入傣族的德昂族

滇西的德昂族是南亚语系孟高緬语族的民族，汉文献中称之为“崩龙”，他们也是滇西边地较早的居民。清代中后期时，德昂族已受到傣族的较大影响，道光《永昌府志》卷十五“群蛮志”说德昂“类似摆夷（傣族）唯语言不同，多居山顶，土司地皆有”。景颇族大量迁入德宏地区之后，山居的德昂族大多向西迁入今缅甸，没有迁走的德昂族大多变成了傣族，其原因是：（1）傣族地区地广人稀，有赖德昂族帮助开发生产（按：由此两族常常居住在一起）；（2）德昂族信小乘佛教和傣族相同，因此风俗习惯方面容易和傣族接近；（3）德昂没有文字，必须颂傣文佛经，因而也容易学傣族语言；（4）傣族的政治经济地位较高，居于统治地位，易使德昂族向往。

融入傣族的布朗族

在布朗族与傣族交错分布的地区，傣族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及人口方面的优势，布朗族受傣族的影响较大，他们大多会傣语、傣文、信仰小乘佛教，民间用傣文书写历书、传说、和道德规范等书籍，许多地区的布朗族逐步融入了傣族之中。如今思茅地区被称为“哈傣”的傣族就是布朗族（蒲人）变来的，他们至今仍保留了一些傣族和布朗族文化整合的痕迹。

回族的傣化

回族在元代时就已进入云南，并逐渐向边疆地区迁徙。

同治十一年（1872年），大理回族商人马武龙等人运盐至勐海曼降，见平坝宽广肥沃，即请傣族头人帕雅捧岱至勐海城子向土司献盐三驮，要求在勐海傣族聚居区建寨定居。经土司同意马氏在今曼蛮回址建寨；另外有一支回族也在清代咸同年间进入勐海傣族地区，居住在曼赛回寨。由于长期和傣族的共同生活和民族通婚（娶傣族女子），他们除不吃猪肉，建清真寺做礼拜外，饮食、起居、服饰完全同于傣族，他们喜欢吃糯米饭，进餐方式与傣族相同，一般不用碗盛，而习惯用手捏团食用；男女服饰与傣族相同，妇女内穿无袖紧身背心，外穿无领细袖紧身上衣，下穿桶裙，绾髻、插簪、包各色头巾；住房为傣族竹楼。由于和傣族长期的水乳交融，傣族称他们为“帕西傣”（傣族中的回民）或“回傣”。大约在清末至民国年间，陆续有回族从内地迁往澜沧等地，如澜沧大山街附近的回族，是从景谷的昔勐山逃难而来的；上允街子的回族是从巍山、临沧、云县等地迁来；下允河边寨的回族多是内地来做小生意而落籍于此的。上下允两地的回族，因长期与傣族生活在一起，服饰、习俗都与傣族相似，他们自称为“傣回族”。如果我们对这部分回族进行线粒体DNA的调查，结论应和傣族妇女相同。

傣族文化对云南边疆地区各民族的吸附力，使我们在傣族的遗传学研究中尤其需要注意对调查人群的选择。遗传学学者们的研究也发现：与傣族邻近的其他民族之间，地理的距离和遗传的距离常常是相同的。例如：钱亚屏、褚嘉佑等学者在滇西南景洪和澜沧两地

分别提取了傣族、佤族、拉祜族这三个起源和文化系统不同民族的 mtDNA, 以及滇西北中甸建塘镇藏族的 mtDNA, 比较研究发现: “从进化树来看, 傣族、拉祜族和佤族紧密地在一起, 而与藏族有较远的距离”^① 该项研究也表明滇西南的部分傣族、佤族、拉祜族历史上有过基因的交流。

2、汉族融入少数民族

汉族融入少数民族之中, 历史上有两种情况: 一是一些汉族男性商人、农民进入边疆民族地区后为了生存, 入赘少数民族变成少数民族, 例如清嘉庆初年, 临安知府江江濬源在他的《条陈稽查所属夷地事宜议》中就记载说: “历年内地人民贸易往来纷如梭织, 而楚、粤、蜀、黔之携眷世居其地租垦营生者, 几十之三四。”又说: “客民经商投向夷地、挈家而往者渐次已繁, 更有本属单子之身挟资迁入, 至于联为婚姻, 因凭借彝妇往来村寨。”汉族入赘上门, 三代后可以还宗恢复汉族的姓氏, 今天许多少数民族中的汉姓就是汉民族融入的印记; 第二种情况是: 迁入某一地的汉族人口少于少数民族, 与少数民族相互通婚, 经济上相互依存, 日久天长而少数民族化。

融入傣族的汉族

如前所述, 傣族是西南边地最大的民族, 人口多、社会经济发达, 因此汉族人迁入沿边傣族聚居地区后, 尤其是清代以前迁入的汉族大多数融入了傣族之中。在西南边地的大多数地区傣族都被人们分为“水傣”和“旱傣”(汉傣), 水傣一般是保留了较为传统的百越文化特征的傣族, 旱傣在历史上与汉族政治、商业、文化上交流较多, 融入了较多的汉文化和汉族血统。

以德宏地区的傣族为例: 明代洪武年间戍守在腾冲一带的汉族士兵就大量逃入德宏傣族地区, 正统年间三征麓川之后, 更多的汉族流入傣族地区。吸收了一部分汉族和汉文化的傣族就变成了旱傣。德宏的傣族和其他地方的傣族一样是没有姓氏的, 元明两代中央王朝虽然赐姓给傣族土司, 但一般百姓仍然无姓。旱傣与水傣最显著的不同点在于: 旱傣百姓大多数有姓, 如德宏州傣族的姓有: 刀、线、多、放、罕、思、龚、克、寸、管、凤、孟、尚、曩、冯、萧、杨、项、鸠、闷、板、蒋等, 水傣百姓无姓。旱傣中有许多由汉族变成傣族的。此外旱傣的祭祀祖先、唱戏、耕作技术等风俗习惯也与水傣有所不同。

又如: 景谷县勐窝的傣族流传着来源于江西的说法, 其因是大约在清代时, 从江西来的汉族到景谷以后, 主要居住在勐窝, 而不是居住在交通不便的勐戛。勐戛的傣族基本上保持了没有姓氏的情况, 只有罕、刀等傣族传统姓氏, 而在勐窝的傣族中, 不仅有罕、刀等姓, 还增加了许多汉族的姓氏, 如刘、李、周、张、姚等, 这是汉人在此地入赘后, 其子孙传下来的。勐窝傣族与汉族交往, 经过长期融合, 使许多汉族变成了傣族。而景谷傣族多系“汉傣”(即汉化较深的傣族), 其服饰与西双版纳颇有不同, 男子头缠白巾, 衣裤皆着汉装, 妇女不分老幼皆穿黑筒裙。住房多为平房, 土木建筑, 以茅草和瓦覆盖。在镇康的户育傣族聚居地区, 傣族中的邵姓、范姓、杨姓祖先是江西、湖南来的汉人, 他们入赘傣家后变成了傣族。

融入佤族的汉族

佤族历史上极少与汉族交往, 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 李定国率部败走缅甸, 途径

^① 钱亚屏、褚嘉佑等: 《应用线粒体 DNA D-Loop 区遗传多样性分析云南 4 个少数民族的遗传关系》, 《遗传学报》, 28(4): 291-300, 2001。

阿佤山时,一部分汉人散落佤族地区融入佤族之中。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云南石屏人吴尚贤在阿佤山的营盘炉房开银矿,建茂隆银厂,到那里“打槽开矿走厂贸易者,不下二、三万。”^①清嘉庆五年(1800年),茂隆银矿被封后,许多汉族流落佤族地区与佤族通婚逐渐融入佤族之中。例如:班洪一带姓吴的佤族被当地佤族称为“过恩火”,意即“汉人之子”。康熙、乾隆年间澜沧募乃银厂矿冶兴隆,内地汉族大量进入募乃,该厂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封闭之后,许多汉族流落佤族村寨,他们与当地佤族结婚,融于佤族之中,在当地佤族村寨中也被称为“过恩火”。茂隆银厂和募乃银厂停办之后,大量的汉族又转迁到西盟佤族地区的新厂永广一带继续开银矿,停厂后部分汉族与当地佤族结婚而定居下来。在新厂永广有不少被称为“靠儒”的佤族,佤语意为“汉佤后代”,就是融于佤族中的汉族。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三佛祖”朱阿霞进入佤族地区时,部分汉族进入西盟佤山,他们娶佤族姑娘为妻,定居西盟。

融入阿昌族的汉族

明代以来汉族移民不断进入滇西的阿昌族地区,许多汉族融入了阿昌族。明洪武年间随沐英征麓川的汉族有一部分留在了陇川的户撒和腊撒,这里有沐氏家族的庄园,迁来的汉族人融入了阿昌族。明正统年间又有一批汉人随王骥三征麓川而定居户腊撒,变为阿昌族。就连户腊撒的土司也是阿昌化的汉族。《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五·世官二》载:“腾越厅户撒长官司土官赖天福,其先赖罗义,四川巴县人”,“腾越厅腊撒长官司土官盖定远,其先况本,四川巴县人。”户撒、腊撒的阿昌族土司,祖先也是来源于四川的汉族。又据民国时期张笏的《腾越边地状况及殖边刍言》云:“按户腊撒人民,原系汉人与阿昌之混种,距今二百年前,干崖土司驱两撒男子与陇川土司械斗,阿昌之一部悉数中计覆没,所有妇女即联合向干崖土司索夫,干崖司招腾冲男子配之,因此,该族男子系腾冲化,而女子则仍阿昌化也”此说不一定可信,但阿昌之中混入了汉族血统是确定的。20世纪50年代调查时,还可以看到这部分阿昌族和较古老的阿昌族的不同之处,如户撒的曼东、田心、曼回,腊撒的曼罔等村,还保留有汉族的“天地君亲师”的神位和“祖宗郡望”,信奉大乘佛教,婚丧节庆多采用汉族礼仪。在梁河的阿昌族中,也有许多是由汉族变来的,如《赵氏家谱》载,梁河阿昌族外来的赵家,乃南京应天府柳弯村人氏,随沐英征南,先驻永昌板桥,后定居腾冲吴邑,传至十三代即尔荣祖到南甸木瓜寨教学,娶小蒲窝石家寨的阿昌族女子为妻,后裔就把赵尔荣视为赵氏阿昌族的始祖,从尔荣到今又是十三代。据芒掌村社会历史调查记载,清初芒掌即已建寨,和汉族杂居,建寨时有赵、营、王、谢四姓杂居,前二姓为阿昌族,后二姓为傣族。谢家乾隆三十一年所建祖坟的石碑上刻着:“历代始祖原籍四川人氏,寄居腾越碗窖,嗣后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祖父移至南甸芒展(即芒掌)居住。”从另外几方面也可以看到阿昌族与汉族文化整合的痕迹,如:(1)、耕作技术和汉人一样,水旱田都种,并在水田施肥料;(2)、家禽种类和汉人一样;(3)、信鬼、祭祖;(4)、房屋形式也同于汉族,泥墙或砖墙、木柱、石基;(6)、结婚要合八字等^②。

融入景颇族的汉族

近代,迁入云南沿边地区的汉族逐步增多,许多汉人进入少数民族村寨时,他们往往上门从妻居,凭借妻方是土著的关系谋生发展。如陇川邦瓦的董姓头人,原来是腾冲勐连

^① (清)王先谦撰:《东华录》,乾隆十一年六月甲午,云贵总督张允随奏折。

^② 云南省编辑组:《德宏傣族社会历史调查》(三),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1版,58页。

的汉族,其祖先董永先到南甸(今梁河)的龙准地方上了尚家(农朵)的门,其子叫来丙中,变成了载瓦(景颇族),会载瓦语与汉语,人又聪明,能办事,寨内公认他为“苏温”。来丙中死后,其五个儿子搬到不同的几个地方发展为若干支派,成为保存汉姓的景颇族^①。

融入壮族的汉族。

明代以来,虽然汉族不断进入,但直到民国时,滇东南沿边的壮族无论在人口数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政治势力等方面均占主导地位,因此汉族人在这个地区的经济文化影响还远不能动摇壮族文化的影响。一般说来:改土归流以前进入壮区的绝大部分汉人已融合于壮族社会之中,改土归流后进入壮族地区的汉族有很大一部分融合于壮族之中。民国《广南县志稿本》载:“夷农村落,各有分布境域,其与汉民杂居者,而有少数与汉同俗,多数夷农始终保持其习惯风俗。数百年来,未尝稍变,则汉民反被夷民同化。汉少夷多,风俗互化,用夏变夷者固多,而变于夷者亦不免。”

3、少数民族汉化

清代以前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数占绝对优势,汉族的迁入多但不成规模,并且入迁者多为单身男性,入迁的汉族因与少数民族通婚而融入少数民族之中。这种情况到清代中叶以后才发生较大的改变。到民国晚期,汉族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涵化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的调查显示,“徙居边境的民族,种类最繁,维其原始血统组织亦大半消灭,而成为变种或混种之新族类。直言之,即同化于汉族之初步情态也。至于现在尚能保持其种族特性及部落生活,而能自成一系者,综其大要,仅有摆夷(傣族)、野人(景颇)、苗族、罗罗(彝族)、傈僳、怒子(怒族)、古宗(藏族)、卡瓦(佤族)等数种”^②这种改变主要是在边疆地区已改土归流的永昌(今保山地区)、顺宁(今凤庆)、景东、普洱、四个府的地区。

滇西的保山地区,从汉代的时后起就是中央王朝重点的移民地区,历史上这一地区进行过多次的大规模移民,有大量的汉族迁入,也有为数不少的百濮人迁到内地。但是,在明代以前,迁入的汉族人绝大多数都融入了傣族和当地其他少数民族之中。到明代时,作为重点移民区的腾越成为了夷汉杂居地,而在保山的怒江坝等地,除了保山城以汉族为主外,四周仍是以傣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万历云南通志》记永昌府风俗说:“潞江诸处皆僰夷”。20世纪50年代时,当时今保山地区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被称为内四县的腾冲、保山、龙陵、昌宁汉族的人口已占到总人口的93.30%,各少数民族的总和仅占6.70%^③。明代以来,这里的少数民族大多融入汉族之中。

今临沧、保山南部地区一带历史上是蒲人聚居的地区,后又有百越、氏羌系的民族迁入。明代开始保山一带设立卫所。大量汉族进入这一地区,这里的各民族开始受汉族的影响,万历《云南通志》卷二永昌府记述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生活已接近当地汉族人,书中云:“咸慕汉俗,而凶吉之礼,多变其旧”。从明代至清代的数百年间,永昌、顺宁(包括云县)一带的各族人民一直处于与汉民族融合的过程之中。如现居住在保山、施甸等地的

^① 中科院民研所、云南民研所编印:《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社会概况·景颇族调查材料之八》,1963年,22页。

^② 张肖梅编:西南经济资料丛书之三,《云南经济》。

^③ 数据来源:云南省编辑组:《德宏傣族社会历史调查》(三),4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1版

许多汉族就是蒲人变来的。至今当地有“蒋蒲满(布朗)、李罗罗(彝族)、真本人(布朗)、阿家多”和“花蒲满、齐阿昌、茶罗罗、欧傈傈”的说法流传。在一些汉族家谱中还有“蒲蛮古族汉化久, 耶律后裔源流长”的记载到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临沧、保山一带的蒲人已大部分融合到汉族中。

滇西南的普洱等地, 原来是傣族土司的领地, 境内有傣族、哈尼族、彝族、拉祜族、等民族聚居, 清代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之后, 许多汉族因驻防而进入, 他们中许多人与当地少数民族交往结婚落籍下来, 更多的汉族人是因为开采铜矿、盐矿和盐茶贸易的兴隆, 从贵州、湖南、湖北、四川等地而来。汉族人口一时急剧增加。以宁洱县为例, 乾隆五十一年(1786 年), 宁洱县就有客籍汉族和屯民 6470 户, 男丁 20991 人, 分别占当时全县户数的 56.9% 和男丁总数的 54.8%^①。汉族迁入之后与少数民族杂居, 以河谷地区居多, 由于汉族在人口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优势许多少数民族融入了汉族。

在滇西南勐腊县的易武, 清代茶叶经济的繁荣使大量的汉族进入了这一地区。这里的佤族、傣族、彝族多被汉族所涵化。据《镇越县新志稿》载: 据传本人(佤族)在元明时期, 人丁尚旺, 有 3000 余户。本人居地盛产茶叶, 是有名的“普洱茶”六大茶山之一, 明末汉族逐渐移居, 由于车里宣慰、易武土司不断侵占其地, 清代时人口逐渐减少, 散居各地。据在曼乃等地的调查, 本人无本民族文字, 近代因与汉族、彝族相交杂处, 受汉族、彝族经济文化影响很大, 多讲汉语、彝语, 服饰大部分与汉族相同, 唯老年人还保存本民族的某些特点。^②汉族迁来后也和当地的“彝族、傣族结婚成家, 有些彝族、傣族就渐渐成为了汉族”, 如 20 世纪 50 年代调查(曼脸)“寨子 17 户, 祖宗是汉族的只有两户, 其他有 3 户祖宗是傣族, 有 12 户祖宗是彝族, 现在都不会讲傣语、彝语了, 全部自报为汉族了。”^③

上述云南边疆民族融合的历史文献记录和民族学田野调查材料, 提示我们在从事民族遗传关系的研究时, 需要慎重选择血样采集人群, 以便于研究的开展。云南边疆地区“隔离群体”的确定有较大难度, 需要民族学和历史研究的配合。此外, 遗传学的研究者还需要了解一些当年民族识别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以利于研究对象的选择和分析, 例如, 摩梭人在云南被划为纳西族, 在四川被划为蒙古族; 云南普米族, 四川划为藏族; 在云南罗平被定为布依族的同一民族群体, 在相邻的师宗县划为壮族。类似的问题在许多地方存在, 我们在做遗传学调查时, 需要先做民族学的调查。

二、遗传学与民族关系研究

随着遗传学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完善, 特别是线粒体 DNA 和 y 染色体 DNA 研究的发展, 人类起源和迁徙的大量远古之迷开始被科学家们所揭示, 遗传学也被学术界誉为“不用挥锹抡镐的考古学”。目前遗传学可以在民族问题的理论研究和解决民族问题研究中的一些难题发挥重要作用。

1、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理论提供科学的依据

^① 根据道光《普洱府志》所载数据得出。

^② 云南省勐腊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勐腊县志》,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 1 版, 114 页。

^③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编辑组:《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综合调查》(二),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4 年 12 月 1 版, 129 页。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是著名社会学、民族学家费孝通教授 1988 年提出的, 研究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理论^①。该理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 中华民族包括中国境内的 56 个民族, 这些民族群体是东亚大陆的共同主人; 第二, 这些民族群体并非各自独立发展, 而是在密切的交往和不断的分化、融合演变中形成的, 其中不仅有政治、经济方面的交往, 还有文化、血缘等方面的交融; 第三, 汉族是多元中的一个重要核心, 他把各民族凝聚在一起。围绕费先生提出的理论构架, 国内社会科学界一直在致力于该理论完善的研究, 1999 年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又推出了力作《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②, 费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也经过修订再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提出, 对于促进民族的团结, 国家的统一有着重要的意义。但该理论在“一体”的阐述上却存在明显的不足缺陷, 我们无法用从“一体”和“凝聚力”的角度解释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中存在类似“石头不能做枕头、汉人不能做朋友”的民族认识, 也无法解释汉文献中“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的汉民族偏见。因此, 我们只能说“一体”是一个政治层面的国家认同概念。但是, 如果民族学、历史学研究者充分了解和运用现代人类遗传学的最新成果,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中华民族凝聚力”学说将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例如 1998 年杜若甫、肖春杰先生的《用 38 基因座的基因频率计算中国人群间遗传距离》的研究, 就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凝聚力”理论和学说提供了科学依据, 该项实验和研究得结论表明: “各地(南方和北方)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血缘相近, 而南北汉族之间血缘更远。各地汉族中融入了大量当地少数民族血缘, 同时, 汉族也有一部分血缘融入了当地的少数民族。汉族与少数民族是根连根的, 这里所说的根是指祖根, 即血缘。所以, 中国目前虽然有 56 个民族, 但合在一起称中华民族是完全合乎科学的, 因为中华民族相互间有相当大一部分共同的血缘”。^③

历史上, 在东亚大陆这块相对封闭的大地理单元内, 汉族和少数民族你来我往的迁徙从来没有停止过, 只是这种迁徙大多象小河流一样长流无声息。因此在文献中大多数没有记载。历史上民族间的迁徙早已使许多民族群体血脉相通, 而这种民族间的血脉交融, 却被现实的文化差异表象所掩盖。因此, 民族学、历史学民族关系的研究要得出科学的结论, 越来越需要遗传学研究的参与。事实上, 在西南地区的民族关系的研究中, 如果我们运用遗传学的技术研究当代少数民族男性的 Y 染色体, 很可能发现许多民族都和汉族有着较近的遗传距离, 因为西南边疆地区很多时候是以单身汉族男性的迁入为主, 他们以充军、经商而来, 为立足和生存, 与少数民族女子结婚而融入少数民族之中。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相邻地区, 甚至较远地区, 如果运用线粒体 DNA 技术研究汉族群体中妇女的遗传标记, 我们很可能发现他们和某一少数民族的遗传距离很近, 因为历史上由于汉族经济的优势地位, 很多少数民族妇女嫁给了汉族。遗传学科学的实验数据和研究结论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宣传和运用, 遗传学与民族学、历史学的相互协作, 其研究的结果将有助于缩小民族间文化差异所产生的心理距离, 促进民族间的交流和认同, 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2、遗传学研究与民族识别遗留问题的解决

^①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88 年 9 月 1 版。

^② 马戎、周星主编:《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11 月 1 版。

^③ 杜若甫、肖春杰:《用 38 基因座的基因频率计算中国人群间遗传距离》, 《中国科学》(C 辑), 第 28 卷, 第 1 期, 1998 年 2 月。

1949年以前,国民党政府只承认汉、满、蒙、回、藏5个民族,无视其他民族的单独存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宣传新中国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因此1953年在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中,全国自报和登记的民族就有400多个,仅云南一省就上报民族260多个,贵州80多个。为了弄清这些自报民族是否是单一民族,1954年,中国政府组织了众多著名的民族学、语言学、历史学专家进行了民族识别。民族识别的主要依据是以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为理论基础,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在实践中,中国的学者们以共同的文化特点和民族自我意识作为识别民族的标准,并参酌历史。^①也就是说民族识别主要是以现代的文化特征为主,适当参考历史。新中国的民族识别从1954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90年,经国家确认的少数民族共有55个。^②目前尚待识别的民族已经很少,他们主要分布在云南和西藏的边缘地区,云南有茫人、克木人、补过人、排角人等;西藏有登人,这些未识别和归属未确定的民族群体都是较为隔离的小群体,大多通过现有的文化特征无法确定他们的归属,如果遗传学的研究介入,将为民族事务部门妥善解决他们的归属提供科学的依据。

3、遗传学研究与古今民族关系的确定

当代遗传学在古代DNA的研究中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1981年,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专家就对长沙马王堆汉代古墓中出土的古尸进行了核酸的分离和鉴定,他们的研究成果被认为是最早的古代DNA研究。^③南方古代民族研究,尤其是唐宋以前的民族研究,由于汉文献记载的缺乏历史脉络十分不清晰,通过古代DNA的研究,可配合民族考古学家揭开民族历史上许多疑团。例如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的悬棺葬和崖葬的民族族属。1999年8月我们在广西南丹白裤瑶地区调查时,当地崖葬洞穴比比皆是,但白裤瑶否认和他们有关,对这些崖葬进行古代人体DNA研究,对于这一地区古代民族历史的研究将有重大意义。今后,民族考古学的古墓发掘都应该邀请现代遗传学专家的介入,以便科学地判断文化遗存的族属,确定古今民族的关系。

结语

民族是文化的共同体,而非血缘共同体,现代民族大多数都包含有来源不同的遗传标记,云南边疆的民族也不例外,因此我们在对研究结果做出解释时,不能犯以偏概全的错误。遗传学是当代人类学研究的前沿性学科,可以预见,以遗传学为龙头,整合语言、民族、历史学科的现代人类学研究,将为中国的民族研究带来新的理论和思想,在解决现实民族问题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开拓出更为广泛的研究空间。

^① 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3月1版。

^② 黄光学、施联朱:《中国的民族识别》,民族出版社,1995年1月1版。

^③ 王贵海、陆传宗:《长沙汉墓古尸肝脏中核酸的分离核鉴定》,载《生物化学与生物进展》,1981年,39:70-75。